

中共對「辛亥革命」的研究

遂 耀 東

一九八一年是辛亥革命七十年週年紀念，中共爲了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進行「和平統一」的政治攻勢^①。並企圖否定繼承孫中山先生遺志，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將他們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新民主革命與辛亥革命掛鉤，進一步奪取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正統。中共的史學工作者爲了貫徹黨的政策，配合這個政治活動，對辛亥革命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與討論。這些研究與討論到武昌首義的十月，達到了高潮，除了分別在廣州與武漢舉行大規模的關於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重要報刊競相刊載有關辛亥革命的研究論文，各大學出版的社會科學性的學報，也編輯了紀念辛亥革命的特輯或專刊，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更發表了政策性的講話。這不僅是自中共建立政權以來，對「辛亥革命」所舉行的最大規模的學術與政治活動，也是自一九六一紀念辛亥革命五十週年以來，中共史學工作者對辛亥革命研究，另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在北京各界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大會上，中共黨主席胡耀邦說：「整整七十年前的一九一一年，以孫中山先生爲領袖的革命黨人，在古老的中國發動了推翻清皇朝的革命」。他並且肯定辛亥革命「在中國大地上樹立了民主的旗幟，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次革命」。並且辛亥革命「作爲民主革命的間端，爲以後一系列的歷史發展打開了道路」。特別是將中共「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勝利，看作辛亥革命的繼續和發展」。^②胡耀邦一反過去中共對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與五四以後中共所領導的無產階級新民主主義革命加以區別，認爲是兩個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解釋。而有意地將這兩個在中國近代史上，性質和意義完全不同的歷史事件聯繫起來。結連的關係點放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期，因爲這次會議中國國民黨

①葉劍英在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前夕，發表談話，提出了所謂「和平統一」的九個條件。胡耀邦的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更提出邀請台北政要的名單。

②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人民日報。

同共產黨實行了第一次合作。同時孫中山先生將「辛亥革命時期的三民主義，發展爲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期的新三民主義」。^③

同樣地葉劍英也這樣說：「孫中山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從而開始了他一生最偉大的轉變，在國際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先生毅然接取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據此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再次改組了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結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統一陣線，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從而推動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蓬勃發展」。「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之奮鬥的革命事業，也就是繼續完成孫中山先生未竟的事業」。因此，他稱孫中山先生爲「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新三民主義」。^④

葉劍英和胡耀邦講話對辛亥革命所作的解釋，完全是根據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中山先生九十誕辰，所寫的一篇「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文章而引申的。在這篇文章裏，毛澤東說「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紀念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爲新三民主義的功績」。「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⑤如今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又再次被提出來，不僅有更現實的政治目的，同時也成爲中共史學工作者，研究「辛亥革命」新的座標點。

因此，中共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劉大年，在他寫的「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的論文：「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傑出代表」，就這樣說：「孫中山爲民主主義而奮鬥，再一個重大貢獻，是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爲新三民主義，實現國共合作，準備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中國共產黨成立，嶄新的形式在中國人面前，這是外在條件。孫中山近二十年一直保持着對馬克斯主義高度景仰和同情。現在他以銳敏的眼光洞察到要使革命勝利，必須『聯共』，接受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幫助，與馬克斯主義結成偉大的同盟。照他說：『我們對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主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朋友』。這是內在的根據，條件通過根據起作用，新三民主義於是誕生了。在這裏，孫中山給自己樹立了一個民主主義革命家所能達到的里程碑。」^⑥

這種解釋體系特別突出在民國十三年一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孫中山先生「明確地接受了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進一步克服了資產階級的不徹底，在怎樣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作鬥爭的重要原則間

③同上。

④新華文摘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號，轉載解放軍畫報一九八一年第一期，葉劍英：「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

⑤「紀念孫中山先生」，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三一八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北京。

⑥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上海文匯報。

題上，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達到了一致性的結論。而進行國民黨的改組。爲了加強國民黨的力量，採取了黨內合作的形式，吸收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從而使國民黨成爲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確立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這次改組使國民黨從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到組織路線有了根本的改變，^⑦從此，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明顯的特點，即：一、結束了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歷史，公開宣佈「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堅決信念。中國共產黨的幫助，領導國民黨的左派，與國民黨的右派進行堅決的鬭爭。二、認清了中國人民的敵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明確的政治綱領，在這個認識基礎上，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明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三、有了一條使國民革命與工農羣衆相結合的比較明確的路線，找到了革命真正可以合作的力量，取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使全國人民的革命熱情高漲。這是孫中山先生從革命鬭爭以來，經過多少次失敗並總結了經驗作出的決策，是對中國革命事業最偉大的貢獻。^⑧

唯有這樣的解釋，才能使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同新民主主義直接聯繫起來。因此，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對發展和壯大的革命愛國統一陣線，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加強國際反霸鬭爭，推動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都是有意義，不過，除了這個現實的政治目的外，還隱藏著更深一層的意義，那就是篡奪國民革命的歷史傳統，取得中國近代革命歷史的發言權。所以，在這個解釋體系下，中共準備更進一步將孫中山先生爲中心的辛亥革命，與創造中華民國的史實，寫入他們準備修改的憲法裏去，^⑨這樣一來，他們在現實裏無法完成的政治「統一」，却在歷史裏已經完成了。

爲了配合這個在歷史上「統一」的完成，中共的工作者在「辛亥七十」的這一年中，除了撰寫了爲數衆多討論辛亥革命的論文外，並且還出版了一系列有關辛亥革命的書籍。這一系列的書籍，主要的有**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形成**；**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第一卷中華民國的創立**；**孫中山年譜**，**孫中山全集第一卷**，**辛亥革命史論文選**上下。

一、金沖及胡繩武著：**辛亥革命史稿**，一九八〇年七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據

^⑦黎澍：「辛亥革命幾個問題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一年第五期。黎澍是中共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自批揭四人幫的影射史學以來，不斷在許多史學集會的場合發表政策的講話。又劉培琮、吳恩壯：「孫中山從舊三民主義發展到新三民主義的客觀原因」，**學術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崔盛河、閻樹恒：「論孫中山的國共合作思想」，**東北師大學報**，一九八一年第五期，都發揮了這種解釋體系。

^⑧同上。

^⑨在中共第五屆人大通過的憲法草案的總綱裡，即將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載入。

作者的後記說，這部書的初稿是一九六二年寫的。一九七九年又作了一遍修改。他們寫這部書，主要的着眼點是想考察一下，辛亥革命作為一次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它的發生、發展的全過程是怎樣的。全書大部份篇幅用在敘述和研究資產階級的形成，發展和所領導的革命活動上。對這個時期帝國主義的侵華活動，清朝政府的狀況及其它有關方面，只作為其他背景，予以概括的說明，沒有很多的展開。⑩這本書共分五章三十八節，即一、風暴的由來，二、一種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現，三、山雨欲來風滿樓，四、暴風雨的襲來，五、革命力量的集結等。⑪

二、中華民國史負責主編者李新，是中共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的副所長，主持該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這本書也是近代史研究所當前進行的重要科研之一。⑫在序言裏說，中華民國史主要寫民國時期帝國主義怎樣由擴大、深入而逐漸被驅走和被消滅；民族資本主義又怎樣在受壓迫、排擠中得到發展，民族資本階級怎樣由領導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幾經挫折和反復搖動而最後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些力量的消長以及他們之間的互相關係，就構成了中華民國史主要內容。但這些都是和新民主主義分不開的，而是以新民主主義為前提而編成的。這本書共分為三編，中華民國有其創立時期（一九〇五～一九一一）民國成立以後又分為南京臨時政府時期（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月），北洋政府時期（一九一二～一九二八）和國民黨政府時期（一九二七～一九四九），將中華民國創立時期和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合為第一編，把北京政府的歷史作為第二編，把國民黨時期的歷史作為第三編，現在出版的第一編共十二章，開卷兩章寫的是中華民國產生的背景，寫了「清代統治的衰落」，「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初步發展」。⑬這是配合上述的「辛亥革命」解釋體系，對以後的歷史發展所作的解釋。對現存的中華民國從歷史根本加以否定，認為從一九四九年起已經祇是一個歷史的存在了。而且中華民國時期的發展，更是以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發展為前提的。這是有計劃，並為一定目標而編纂的一部書。為了編纂這部書，還編輯了三種資料書，即一、中華民國大事記，二、民國人物傳，其中人物傳記一千餘人。第一卷已由中華書局出版。三、專題資料，已擬出專題六百餘個，每一個專題字數不定，以少而精為原則。⑭

⑩金沖及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後記」，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

⑪辛亥革命史稿「目次」。

⑫中國歷史學一九七九年年鑑「一九七九」頁二八三，三聯書店，一九八一，香港。

⑬李新「中華民國史第一編序言」歷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該書已由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七月出版。

⑭同注李新、孫恩白主編的，民國人物傳第一卷已由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年出版。

三、孫中山年譜：屬於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之一，^⑮由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所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學歷史系聯合編輯的。這部年譜的編寫工作，在一九六四年五月開始，成立了「孫中山年譜新編」編纂組，參加的單位有廣東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廣東文史資料研究會、廣東省文史研究館、暨南大學歷史系和華南師範學院歷史系。編纂組長吳仲儀，副組長張其光陳錫祺和胡希明，一九六六年年譜初稿分五冊打印，後來文革亂起，工作中斷了。一九七六年，由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和廣東社會科學所歷史研究室對年譜進行了修訂，並改名孫中山年譜，分三冊印成徵求意見稿，一九七七再作一些修改，在中山大學學報一九七八年年一至六期連載，先後收到了不少意見，從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起，又由廣東社會科學所歷史研究室的張磊、黃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尙明軒，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段雲章對年譜加修改和補充，最後由李新校訂。^⑯

三、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由中華書局出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研究所、中山大學和廣東省社會科學研究所三個單位中的專業研究室分卷編纂。第一卷收錄自孫中山先生自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一一年的著作三九八篇，約三十八萬字。「具體地表現了他從一名愛國學者成長的革命領袖，以至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十二年間，思想發展和鬥爭實踐的過程。」第一卷資料中有許多原件的底本以及從英、日、法、俄文翻譯的資料七十篇。^⑰

辛亥革命史論文選（一九四九～一九七九），由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編輯，章開沅負責主編，選編了六十多篇論文，「大體上反映了辛亥革命研究三十年來的發展情況」，^⑱書後附有上錄了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所編輯的有關辛亥革命的文章目錄索引。「目錄索引」共收錄六百多篇過去三十年，中共史學工作者關於辛亥革命研究的論文。辛亥革命史論文選，分上下兩冊，由中華書局印行。

從上述幾種書籍的編輯和出版的過程，中共擴大紀念辛亥革命，並不是偶然發動的一個政治活動。為了配合這個政治活動，在學術研究領域裏早已完成了準備，一九七九年在廣州召開的「孫中山及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不僅是對他們過去三十年辛亥革命的研究作一個回顧和檢討。並且將不同的意見集中，作為現在所出現

^⑮該年譜已由中華書局於一九八〇年七月出版，與民國人物傳同屬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中的一種。

^⑯孫中山年譜前言。

^⑰黃彥：「介紹『孫中山全集』第一卷」，歷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⑱辛亥革命史論文選上下，三聯，一九八一年六月，北京。

的對辛亥革命的解釋體系新的發展起點。

二

辛亥革命史論文選附錄了有關辛亥革命史的文章目錄索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共收錄了六百多篇有關辛亥革命的文章，從這些文章的分類情況，也可以反映出自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以來，對辛亥革命研究發展趨向。

目錄索引分類的情况是這樣的：一、綜述，二、辛亥革命時期的經濟，三、辛亥革命時期的各階級與華僑，四、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人民反帝鬥爭，五、同盟會等革命團體的建立及其活動：①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形成及改良派的鬥爭，②同盟會等革命團體的建立，③革命黨人的活動與同盟會領導下的武裝起義。六、人民羣衆的反封建鬥爭，七、清末「新政」和立憲運動，八、武昌起義，各地響應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①武昌起義，②各地響應，③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九、帝國主義對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壞，十、辛亥革命的性質、意義和歷史教訓；十一、辛亥革命時期的報刊和文學藝術；十二、人物及其著作：①孫中山，②章太炎，③鄒容、陳天華，④秋瑾、徐錫麟等，⑤黃興、宋教仁、朱執信、廖仲愷⑥張謇，⑦其他人物。⑩

從這些有關辛亥革命史的文章，發表的時間看來，對於辛亥革命的研究，自中共建立政權以來，一直在繼續進行着，但却不是一帆風順的。他像其他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一樣，配合了不同階段的政治發展，對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而有不同的解釋。不過，一九五七年所出版的八冊**辛亥革命史料**，應該是中共史學工作者，討論辛亥革命這個問題的重要起步點。

這部由中共「中國史學會」主編，柴德賡負責編輯的**辛亥革命**，匯集了自興中會創立至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期間（一八九四～一九一二），一百二十多種文獻資料編輯而成的。這部共分八冊，三百餘萬字的資料匯編，⑪不過是中共史學工作者，爲了實踐毛澤東所謂運用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再具體地研究中國現狀和中國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問題。⑫而編纂的自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一系列中國近代史料。「辛亥革命」不過是八種中國近代史資料中的一種。也就是將「辛亥革命」視爲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一個發展階級，屬於中國近代史分期的範疇，並沒有特殊的意義。

⑩**辛亥革命史論文選**（下）頁一二六三——三一四。

⑪劉德麟、何雙生：「建國以來出版的辛亥革命史料述略」，**歷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⑫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七五五。

關於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是中共史學工作者應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歷史以後，而引起討論問題。不過，卻不像其他那些歷史問題那麼複雜。因為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中國便一步步變成了半殖民地社會。而自一八四〇至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八十年間，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毛澤東早有明確的說明，^{②②}因此，不像中國上古史分期那樣，對其上限與下限引起許多爭議，那就是中國在何時由奴隸社會渡到封建社會的問題，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迄今仍然沒有得到一致性的結論。至於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自一九五〇年展開以來，一直局限在鴉片戰爭與五四運動之中，所爭議的祇是這八十年中的發展的階段而已，大致認為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有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辛亥革命是其中之一。不過，在中國近代史分期開始討論之初，對辛亥革命至少存在着兩種不同的解釋。

其一：從同盟會成立到袁世凱取得革命政權（一九〇五～一九一二）這是中國近代史中的第三次革命的高潮。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向憲派進行了劃清界線的論戰，連續組織了多次的武裝起義，當時正是小資產階級，在羣衆中廣泛展開了愛國行動與思想解放的熱潮；也在一定程度內影響了工人和農民。另一方面是清政府的立憲，資產階級君主憲派的憲法運動，外國帝國主義為爭奪中國進行了激烈的鬥爭，終于辛亥革命爆發，在武昌起義後的五個月，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世凱接受了南京政府所授予的大總統的職位，標示出這次革命而結束。^{②③}

其二，是從甲午之戰戰敗，孫中山先生對清廷絕望，在烈強瓜分中國的刺激下，在檀香山組織了興中會，其誓詞不僅有「驅逐鞑虜，恢復中華」，並且提出了「創立合衆政府」的口號，並準備武裝起義，而和農民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初步劃清了界線，標示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真正開始。到了一九〇五年在俄國革命刺激下，同盟會在此時成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才具有比較完整的意義，也是革命派反對改良派逐步劃清界的產物。另一方面，同盟會提出了民族、政治、經濟、文化較全面性的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革命綱領。並提出了建立中華民國的主張，而且領導了全國性的革命，把辛亥革命推上了日程，這是標示出「比較更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開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九年，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展開，及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過渡階段。^{②④}

②②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五八九—五九六。

②③胡繩：「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原載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六期，現收入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三聯，一九五七年，北京。

②④孫守任：「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的商榷，原載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六期，現收入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

這兩種不同的論點，前者認為中國近代史具體的特徵，基本上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後者是應用毛澤東矛盾論中，不同的主要矛盾性質軟化，作為中國近代史的分期標準。這兩個由不同立論，對辛亥革命，所作的解釋雖然在以後的中國近代史分期的討論中，引起廣泛的討論，^{②⑤}都沒有突出辛亥革命所具有的重大歷史意義，而將辛亥革命作中國近代史的一個轉變的過渡階段。也就是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新民主主義的發展階級，這個論點二者是一致的。而且是根據毛澤東對辛亥革命所下的定義，所得到的結論。

因為毛澤東說：「認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從孫中山先生開始，才有較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並且說：「中國革命必須分兩個階級，第一步準備階級，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自封建社會改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而辛亥革命則是比較完全開始了這個運動。」^{②⑥}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改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第一個步驟的準備階段，自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變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就開始了。中國人民在不同的程度時間中和不同的程度，實行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為建立一個獨立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比較完全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這個革命按其社會性質，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以來起了變化，在這之前屬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屬於舊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之內。因此，辛亥革命與以後所謂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是兩個不同的步驟，而且性質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自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展開討論以來，辛亥革命一直附着中國近代史一併討論，並不具有特殊的意義。

對於辛亥革命具體的研究，應該自一九六一年開始。一九六一年是辛亥五十週年紀念。中共中國史學會和湖北哲學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辦了「辛亥五十週年學術討論會」。會期自十月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一日，在辛亥革命的所在地武漢舉行，參加這次討論會的所有一百多人，並提出四十多篇關於辛亥革命的論文，後來這些論文收在中華書局出版的**辛亥五十週年紀念論集**中。

這次討論會的主持人李達在開幕時說：「何況辛亥革命的歷史又如此豐富，不

^{②⑤}毛健子：「關於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的介紹」，原載史學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現收入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

^{②⑥}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六二七。

僅我們研究過的問題，須要作出具體的結論，對於還沒有研究的問題，也需要進行探索，如人民羣衆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這是大家都肯定了的。但是，怎樣充份說明，也需要繼續努力。再如，關於歷史人物的研究，對資產階級革命派我們比較注意了孫中山，但對孫中山的思想研究仍然還不够；對黃興、宋教仁等的研究則更不够。對立憲派人物，我們比較注意了康有爲和梁啓超，但對其他的人，則研究得很少。此外，對地區的革命活動，雖然作過一些，也同樣感到不够。」^{②⑦}

李達的講話，對中共史學工作者過去所作的「辛亥革命」研究，加以說明並提出了檢討。這次的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是第一次將辛亥革命從中國近代史中突出起來，作爲一個單獨的重大歷史事件，而舉行的討論會，因此討論的範圍比較廣泛而深入。

這次討論的問題有：在辛亥革命中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究竟是聯合陣線，還是特殊的結合，是利用還是依靠^{②⑧}，討論熱烈的是參與革命的會黨，會黨是一種秘密的結社，必然是階級的產物，成份非常複雜，作爲階級鬭爭的工具，有時爲革命服務，有時又被反革命利用。因此，對構成會黨份子的階級成份與性質，進行探討，這些會黨份子，是農民還是小手工業者，是散兵游勇還是江湖流民，是城鎮居民還是無產階級流氓，而有不同的意見，並引起了廣泛的興趣，討論會結束後，相繼出現了許多有關辛亥革命時期會黨的論文，對這個問題作了更深入的探討。^{②⑨}

在辛亥革命準備與發動過程中，新軍發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就性質而論，新軍是清政府重要國家機器的一部份，是清統治者鎮壓人民與革命的工具。但由於新軍的來源，一部份由舊有的軍隊改編，一部份是招募而來的。在招募的部份中，有的採取考試，而吸收了一部份知識份子，所以在新軍士兵中，很多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的，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感染，而使辛亥革命期間新軍所以日趨革命化。這是由於革命情勢發展的影響，與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新軍中長期艱苦工作而促成的。所以，與會者對於新軍的成份與性質，和其在辛亥革命中所發生的作用，進行了討論。^{③⑩}

②⑦ 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七，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十月二版。

②⑧ 邵循正：「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問題」，汪詒孫：「辛亥革命時資產階級與農民關係問題」，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九九—一四六。

②⑨ 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學術討論會後，相繼出現了若干討論會黨與革命關係的論文與討論，林增平：「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會黨和農民一讀『辛亥革與會黨』文質疑」，教學與研究，一九六二年一月號。石羊「關於會黨問題的討論」（學術動態）教學與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一期；與「關於辛亥革命時期會黨問題的討論—辛亥革命五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討論綜述之二」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③⑩ 陳旭麓、勞紹華：「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文匯報學術月刊一九六一年第四期，後收入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關於辛亥革命時期，幾個資產階級代表性人物的評價問題，一、章炳麟在革命期間的活動與思想，究竟代表了那個階級的問題，宋教仁是否是資產階級好的革命家，辛亥革命以後，是倒退了，還是沒有倒退；張謇在辛亥革命前後，屬於民族資產階級，還是屬官僚資產階級的問題，都進行了討論，甚至於爭論。至於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思想形成的過程，一般認為在一八九七年以前，還沒有平均地權的思想，在一八九四年上李鴻章當時，僅提到地盡其利，只是生產技術改進，一八九七年游歐美以後，才開始形成民生主義的思想，對於形成的過程也進行了討論。^⑪

「反滿」是辛亥革命時期所提出的口號。這個不僅是資產階級，口號同時也是廣大羣衆的要求。實際上，反滿，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主義是一致的。透過「反滿」的口號，使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統一起來。但這個口號的作用是什麼？以及其與以往太平天國，義和團反滿羣衆鬭爭的關聯性是怎樣的，而進行討論。^⑫

在辛亥革命期間社會主要的矛盾是什麼？是民族的矛盾，是國內階級的矛盾，還是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同盟間的矛盾，關於這個問題，在會前就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辛亥革命期間，只包括一個反封建的主要矛盾，有的認為當時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這兩種不同意見的焦點是：義和團運動被鎮壓後，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是否深刻化了；義和團運動被鎮壓後，社會主要矛盾的地位是否轉化；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統治者三者之間的關係怎樣。因此，在會中引起了爭論^⑬，而會後這個更引更廣泛與深入的討論。由於討論帝國主義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涉及所謂的日本「志士」，對革命的幫助，是別有用心；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進行政治化的手段；還是中國真正的朋友的問題，也提出了討論^⑭。

這次的「辛亥五十週年紀念學術討論會」，就還繞着上述幾個不同的問題進行討論，討論的範圍非常廣泛。經過這次討論，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已從中國近代史分期的範疇跨出來，具有其自身所代表的歷史意義，從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到一九六

⑪「辛亥革命五十週年學術討論討論的一些問題」歷史研究一九六一年第六期。胡繩武、金沖及：「辛亥革命時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歷史研究一九六一年第四期，陳旭麓：「論宋教仁」歷史研究一九六一年第五期，徐崑：「張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動」文匯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⑫劉大年：「辛亥革命與反滿問題」，歷史研究一九六一年第五期，後收入辛亥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⑬吳雁南：「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李時岳：「辛亥革命與帝國主義——兼論辛亥革命戰爭的主要矛盾」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論集（下）頁六五九—六九九。「關於辛亥革命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和反滿問題的討論」——辛亥革命五十週年學術討論會綜述之三，文匯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及華東師大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組，安徽合肥師大歷史系，四川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組以及南京史學界都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⑭章開沅：辛亥革命史論文選前言。

二年之間，各報刊發表關於辛亥革命的論文二百篇以上，並且編輯了許多與辛亥革命有關的資料，因此，一九六一年是中共史學工作者對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起點。不過，不論對這個問題如何熱烈，研究得如何深入與廣泛，都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針，準確領會有關經典著作的精神特質，這個對辛亥革命研究的框限，却是永遠無法突破的。

三

一九六一年為紀辛亥革命五十週年，而掀起的辛亥革命研究熱潮沒有繼續太久，就被一九六六年捲起的文革風暴吞沒了。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間，辛亥革命的研究像意識形態領域裏其他學科一樣，同時遭受到摧殘。在這十年間所發表關於辛亥革命的論文，不會超過二十篇，而且是配合了儒法鬭爭的歷史解釋體系，由工農兵寫作撰寫，並沒有實際的學術價值可言。^⑤

所謂「儒法鬭爭」的歷史解釋體系，在一九七三年隨着「批孔」而展開。在批孔的同時，又突出了秦始皇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將秦始皇作為新興地主的總代表，根據法家的理論統一了中國。這樣和作為維護沒落奴隸制的孔子對立起來，形成兩條路線鬭爭的儒法集團。然後以儒法鬭爭的復辟反復辟為主軸，貫穿了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在儒法鬭爭的過程中，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階級基礎和政治內容，但總是保守和革新，前進和倒退，復辟和反復辟兩條路線的鬭爭。於是，總結了儒法鬭爭和整個階級鬭爭，完成了他們的解釋體系^⑥。在儒法鬭爭的歷史解釋體系中，將中國歷史分成三個時期：一、春秋戰國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時期的儒法鬭爭，二、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封建社會的儒法鬭爭，三、近代資本階級及民主革命時期。

辛亥革命即屬於近代資本階級及民主革命時期儒法鬭爭中的一個發展階段。自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一步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歷史進入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一八四〇——一九一九）。中國近代出現了新的生產關係——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發展資本主義，求得國家的獨立和民主，舉起了尊儒反法的旗幟，提倡革新和革命。他們吸收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文化，同時也

^⑤如上海二十一棉紡廠工人理論組寫的「辛亥革命前後的儒法鬥爭」，蘇州長風廠工人理論組寫的「裁軍是假、用兵是真——讀章太炎『弭兵難』」等。

^⑥拙作「批孔，中共史學的革命樣板戲」，見《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頁一〇九——一四〇，時報出版公司，民國六十八年，台北。

繼承了傳統的法家思想。但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他們的鬭爭也是不澈底的。中國近代的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鬭爭，大體上和中國資產階級反帝反封建結合在一起，而合為四個發展與轉變階段。一、鴉片戰爭時期，二、戊戌政變時期，三、辛亥革命時期，四、五四運動時期。^{②7}

因此，辛亥革命也是近代資產階級及民主革命時期中，儒法鬭爭的一個發展階段，他們認為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中國民族資本得到初步的發展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隊伍，其中許多人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骨幹。他們代表和反映了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系較少的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利益，主張通過暴力革命道路，推翻清政府的反動統治，求得國家的獨立和民主，他們積極宣傳革命思想，組織革命團體，發動一系列的武裝起義。為了掃除障礙，把革命向前推進，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對以康梁為首的保皇派進行堅決的鬭爭，展開了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大論戰。論戰主要是圍繞着：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實行民主共和，要不要改革土地制度幾個問題而展開。

這實質上是革命還是保皇兩條政治和思想路線的鬭爭。在這場鬭爭中，革命派高舉尊法反儒的旗幟，同封建買辦勢力及保皇黨的尊儒反法思潮進行了激烈的搏鬥。保皇必須尊孔，尊孔又總是和反法聯系在一起的。保皇派極力鼓吹尊儒反法思想以反革命。資產階級為了宣傳革命，大造革命理論，就必然要相對地宣揚尊法反儒思想。因此，隨着革命的深入發展，「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兩種思潮鬭爭越來越尖銳，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同保皇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鬭爭的一個重要的內容。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這場鬭爭中，擊敗了保皇派。揭露了保皇派的反動面目，宣傳了革命思想，促進了人民的醒覺。為辛亥革命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作了思想輿論準備。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爆發，推翻了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政府，結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也暴露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性和革命不澈底性。他們不能提出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不能充份發動依靠廣大的農民羣衆。辛亥革命最後還是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絞殺。政權落到大軍閥袁世凱的手中。^{②8}

這種解釋體系，在後來批揭四人幫時期，被稱為隨心所欲地偽造歷史，別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現代大儒，「古為幫用」的影射史學^{②9}。因此，自一九七四年以後，中共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被納入「儒法鬭爭」的框限

②7北京大學儒法鬥爭史編寫小組：「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儒法鬥爭」（儒法鬥爭史概況初稿）北京大學學報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②8同上。

②9同②8。

中，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混亂不堪。直到四人幫被打倒以後，中共的辛亥革命研究才又一次得到了解放。中斷了十年以上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復和發展起來。尤其一九七九年由中山大學、辛亥革命史研究會、廣東省歷史學會聯合在廣州舉行的「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學術討論會」，被中共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者認為，是「春天飛來的第一隻燕子」^④。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學術討論會」，自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在廣州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共史學工作者一百四十一人，共收到八十四篇文。討論會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着重批判四人幫在辛亥史研究方面，所製造的問題和留下的問題。第二階段進行分組討論：一、關於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二、對南京臨時政府的評價；三、關於黃興、章太炎、宋教仁等代表人物的評價問題；四、關於立憲派的評價等。這是自一九六一年舉行的「紀念辛亥革命五十週年學術討論會」十八年後，以同一主題所舉行的學術討論會，也是中共建立政權三十年來，舉行最大規模的辛亥革命史討論會。

在這次討論會中，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問題，認為過去許多研究者，往往過份強調農民在革命中的自發性，而貶低了資產階級的覺悟性，因而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作出了不確的估量，而且四人幫「立足於批」的方法，更破壞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在這次討論中，有人認為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的高潮，這是因為辛亥革命代表新的生產力、生產關係建立的新的生產關係。而農民發動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都沒有觸動舊的生產關係，也不能建立超越封建制度的新制度。另一方面認為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與洋務運動、維新運動，構成中國近代歷程中的三個階梯。而辛亥革命更開始了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方向。

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是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擔負了民主革命倡導者的使命，這個階級居于時代的中心，並且在革命的進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政治舞臺上扮演了高明角色。革命民主派提出了共和制要求的革命綱領，並進行長期的鬥爭。無疑地，資產階級革命派所領導的民主革命是先進的。過去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往往偏低，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光輝的篇章。在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只有辛亥革命才真正具有在社會生產方式和意識形態方面革故鼎新的內涵。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年的封建帝制，經歷這場政治、思想領域中

④章開沅：《辛亥革命史論文選前言》。

④張磊：「『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述評」《中國歷史》一九七九年年鑑頁二三八一—二四四；吳乾兌：「孫中山和辛亥革命討論」，一九七九年百科年鑑頁四五七。

變革和啓蒙，才有後來奔騰不息的民主思潮。沒有辛亥革命，也就沒有五四。更進一步地說，沒有資產階級領導舊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也就沒有後來無產階級領導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革命。^{④②}

正確評價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與作用，就是為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先生，作出恰當的評價^{④③}。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不愧是一個站在正面指導歷史潮流的偉大人物。他建樹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尤其以辛亥革命時期的貢獻更突出。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具有創時代的意義，他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擺脫殖民地附屬國的厄運，是他畢生奮鬥的目標。孫中山先生是戰鬪的民主主義者，不能容忍延續千年的專制狀態，堅決主張採取國民革命手段，以資產階級共和國，對民主立憲政體學劃貫穿了「主權在民」的觀念。孫中山先生的政治方案，摒棄了農民階級的皇權主義，突破了改良派君主立憲的藩籬，成為當時最先進的最科學的政綱。使中國脫離落後貧困臻於富裕，是孫中山先生夢寐以求的願望，他所制定的近代化經濟建設方案，幾乎完全擺脫了閉關自守的局限，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向^{④④}。

為了實現自己的革命政治綱領，孫中山先生足跡遍全球，並且組織了革命團體和政黨，發動了多次武裝反清鬪爭，廣泛地傳播了革命民主思想，終於點燃了焚毀清帝國的辛亥革命火焰。孫中山先生在實際鬪爭中成為革命民主派的旗幟，被革命黨人和廣大羣衆公認為領袖。雖然對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評價予以積極的肯定。但對孫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却有存在不同的岐見，有的認為他的世界觀是唯物一元論的，有的認為他的哲學思想很複雜，是二元論的，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④⑤}。

由於對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評價的同時，也涉及對其他革命代表人物的評價問題。因為在承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領導地位時，也要充份估計其他革命領導人的作用，如黃興、章太炎、宋教仁、朱執信、廖仲愷等，甚至於後期走向反面的胡漢民、汪精衛等，對於他們前期的活動，也應做一個適當的評價，過去對這些人物研究得不够。黃興是同盟會主要領導人，關於討論他的著作却很少。對於胡漢民複雜、變化多端的人物，更缺乏真正的研究和分析。對歷史人物評價缺少歷史觀點，就會導

④②同上。

④③關於孫中山先生的評價問題，認為討論辛亥革命，如果沒有孫中山先生就毫無意義可言，一九五六年孫中山先生九十誕辰展開，並形成了一個高潮。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其發表了論文二百多篇，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建立政權的三十年間，共出版了有關孫中山先生的專著十五部，發表在報刊上的論文、回憶錄、訪問及有關的資料近六百篇。

④④同①①

④⑤同⑤

致錯誤與荒謬的結論。以宋教仁為例，六十年代中期被戴上「議會迷」的帽子，黃興也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於是他就成了革命路線鬭爭的犧牲品。因為要以路線鬭爭貫穿辛亥革命階段全部的歷程，就必須在革命營陣裏，為孫中山先生樹立對立的一面。這樣一來，黃興與孫中山先生原來某些非本質的分歧，就被提升為路線的鬭爭。^{④6}

關於辛亥革命期間的章太炎，雖然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見，不過大致認為章太炎的思想複雜性，而且是個一生多變的人物。章太炎在革命時期屬於民主派，主張反帝愛國，反滿革命，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制，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這些觀點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大體一致。但對章太炎在一九〇七年以後，與孫中山先生發生了矛盾與糾紛的看法並不一致，一般認為章太炎的作為，使革命隊伍發生分裂，破壞了同盟會領導集團的團結，在羣衆中間製造混亂。後來又鼓吹「革命軍興，革命黨消」，更加劇了形勢的逆轉^{④7}。

關於辛亥革命的南京臨時政府，過去不甚重視。僅將南京臨時政府視為革命派、立憲派和舊官僚的混合體。其短促的存在，被歸結為革命派妥協、退讓的過程。不過，自武昌起義後，孫中山先生和他的革命伙伴，所力求的是在封建帝制的廢墟上建立共和國。他對袁世凱的態度與關係，是一個複雜變化的過程。但却不能用「妥協」二字概括。孫中山先生在返國途中，對當時的革命情勢沒有作全面的估計，沒有意識到舊勢力的強固與狡猾，只是一心期望及早「鞏固國基」。到上海南京後，孫中山先生對袁世凱的真正面目有所認識，加以同盟會內部反妥協力量的影響，而後情勢逆轉，特別是同盟會的渙散，使革命失去了領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臨時政府控制在革命黨人的手中，並在不得不讓位於袁世凱的情況下，作了預防和限制的措施，而制定了「臨時約法」。

至於臨時政府的性質問題，不能視為革命派、立憲派和舊官僚的「聯合政府」，或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政權，應視為以革命黨人為主的政權。因為同盟會當時並未解體，仍然發生作用。參議院議員四分之三是同盟會會員。在四十三個參議員名額中，有三十三人是革命派，立憲派僅佔八人。在臨時政府中舊官僚與立憲派，雖位居總長之職，但他們大抵都未到任，由革命黨人充當次長，掌握實權。臨時政府所頒佈的三十餘項法令，多利於民主政治，參議院通過「臨時約法」，更具有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憲法的性質^{④8}。

④6同④1

④7同④1

④8同④6

至於立憲派在辛亥革命中所發生的作用，過去很少注意。而且將立憲派視為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與清政府混為一談，因此只見到他們反動的一面。不過，他們既屬於資產階級的上層，就必然存在着兩面性。所以，立憲派在革命期間所表現的積極面，反對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與清政府出賣權益，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封建制度。在反對清政府的假立憲，他們發動的保路運動，成為革命的導火線。所以，革命派與立憲派在愛國反封建，發展資本主義與向西方學習方面，有其一致性。其區別不在本質，而是程度上的差異，所以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合流的趨勢。不過，也有另一種意見，認為討論立憲派在辛亥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就不能離開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矛盾的焦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推翻或保存滿清政權是一個歷史的發展的關鍵問題。雖然立憲派在辛亥革命期中，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其基本的政治傾向，還是在於保存現有的制度和政權的。但消極的一面，在辛亥革命期中，立憲派幾乎完全投入反革命的懷抱。所以立憲派與革命派有着本質的差異，他們捲入革命的目的，是企圖從內部奪取政權⁴⁹。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是中共為了紀念建立政權三十週年，所舉行的一系列活動中之一。舉行這次討論會，一方面是為徹底清除四人幫在史學領域的遺毒，這是一九七七年，在意識形態領域開的對四人幫批揭運動繼續的發展。另一方面總結了過去三十年，中共史學工作者對辛亥革命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這次討論會中不僅予以孫中山先生前所未有的最高評價，並肯定辛亥革命變革和啓蒙的歷史意義和價值，為後來紀念辛亥七十週年，對辛亥革命所提出的解釋作好了準備。

附記：本文是應韓國中國學會之邀參加該會舉辦的中華民國史學討論會，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六日在大邱天主教曉星女子大學的講演稿。